



汉语教材开发一直在路上

凌波文/图

国家汉办主任、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日前表示，孔子学院开办至今共涉及90多个语种，其中有85个语种缺乏汉语和当地语言对照的字典。语言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多领域交流的先行官，可没有配套的教科书或教辅书，先行官的步子迈起来比较艰难。

开发与当地实际教学相配套的汉语教材、教辅、工具书是当下之需，而如何开发则是当下之题。

开发应当“入乡随俗”

走进孔子学院总部的国际汉语教学资源展示区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韩语、英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等版本的国际汉语教材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按功能分类的汉语工具书、文化书，如：《中国好人》《中国古镇》《汉字五千年》等；还有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“汉语教学有声挂图”，挂图配有46种语言发声，操作只需“哪里不会点哪里”。孔子学院总部/国家汉办教材处处长张彤辉介绍说：“经过10年努力，孔子学院完成了总部多语种主干教材库、孔子学院本土教材库、数字教材编写指南平台、数字图书馆、教材专家信息库、案例库等多项基础建设。主干教材涉及54个语种，本土化教材涉及52个语种，汉语工具书涉及20个语种。构建了面向孔子学院以及海外从幼儿到成人多层次、多需求、多语种的全方位国际汉语教材体系。”目前，汉语教材建设已经基本解决了“有没有”的问题，在向着“追求更好”的目标努力。

“我曾在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工作过。我发现，一些俄文版的汉语教材让低年级学生使用还可以，但到了高年级，学生更需要针对俄语发音和音系特点而编写的专门的汉语辅导资料。针对性强的辅导教材更有助于学生学习汉语。”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教师杨宏说。

“针对性”也可以理解为“本土化”，“本土化”教材扎根于当地的文化背景和汉语教学实

践，注重学生用户的体验，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。“以国内汉语教材编写思路闭门撰写的教材没有市场，权威、经典的外向型教材才能受到使用者的欢迎。随着国际汉语教材建设的不断推进，汉语教材本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。”张彤辉说。

选择需要因人而异

教辅资料可以不拘于常规的课堂教学范围，也不必拘于课本的形式，可以突出趣味性、文化性、便捷性。

西班牙画家费尔南多将画画与学中文结合，出版了特色汉语教材；依托电视节目《非诚勿扰》，江苏广电和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为外国人“量身订做”了汉语教材《非诚勿扰高级汉语听说教程》；孔子学院总部也开发了《中国好东西》、《中国人的生活故事》、《中外文化差异案例库》、《百部中国电影》等文化教材产品。

云南师范大学马里留学生塞杜说：“《精选法汉词典》是我用过的很好用的工具书，它教会了我怎么在汉语词典里找到你不认识的汉字，同时会注释这个词的词义、词性和用法。一举多得！”

“对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说，挑选一本适合自己的教学辅助资料十分重要。要了解自身的汉语水平，例如，对于一个零基础的汉语学习者，如果想要通过汉语水平考试（HSK）3级，根据考试要求，他至少应该掌握约600个汉语词汇，掌握一定数量的基本语言点，掌握一定的话题和任务。那么，他就应该根据这些目标选择相应的辅导书作为辅助。现在有不少留学生习惯使用手机APP词典作为教辅工具，但是当前的很多手机APP词典存在着“释义不准确，词性标注错误，例句过时”等问题，容易使学生形成一些难以纠正的错误。所以，选择一部经典、权威且适合自己汉语水平的工具书十分重要。”国际汉语出版中

心总经理苗强如是说。

教辅图书发挥着学生们“课下师友”的作用。教辅图书像老师一样引导着学生扎实知识基础，又像朋友一样，用学生感兴趣的、贴近生活的话题激发着学习动力。

评估不能操之过急

“我去年使用的汉语教材现在就不再用。因为我发现了一本新教材，它是用我的母语翻译的，非常适合我的阅读习惯，而且里面的话题我也很感兴趣。”土库曼斯坦留学生克丽丝说。

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，正因为如此，工具书、教材、教辅的开发编著往往滞后于实际需求。即使已经出版发行的也要在一个时期后进行修订。编著教材有专业而客观的标准，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。使用者的情况千差万别，对教材信息的采集各不相同，所以对工具书、教材等的效果评估也不能简单化，不能操之过急。

“语言即是生活，语言教学的内容即是生活的世界。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深入地影响社会生活，语言教学同样面临着教材、教学形式的变革。教材没有最好的，我们的汉语教材建设一直在路上。”张彤辉说。



吴允红老师自2000年开始在英国莫尔文圣詹姆斯女子学校（Malven St James Girls' College）教中文，至今已有16年。我和她也是在那时相识的，当时《学中文》版刚刚创办3年。多年来，我们一直通过网络联系，却从未谋面。昨天，她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到访海外版，带来了丰富的信息。作为一所创办于1893年的寄宿制精英私立学校，中文是莫尔文圣詹姆斯女子学校小学部的必修课。近年来，伴随着全球“汉语热”，学校中学部各年级选修中文的学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。据吴老师介绍，在她提议下，学校图书馆多年来一直订阅人民日报海外版，但由于懂中文的人少，最初报纸的阅读率并不高。随着学生的中文习作不时发表于《学中文》版，人民日报海外版成了“香饽饽”，或为了保留自己的学习成果，或为了借鉴他人经验，经常有人阅读，吴老师在课堂上还常选用《学中文》版上的文章作为补充阅读资料。校方对于开设中文课也愈发重视和支持。有中国国家级的报纸鼓励学习中文，令学校里教授其他非英语语种的老师很是羡慕。

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和回避的事实，中国在国际政治、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，影响力不断加大。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之际，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，希望海外版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、易于理解的语言，讲述好中国故事，传播好中国声音，努力成为增信释疑、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。吴老师根据亲身体会强调说：“可千万别小看发表在《学中文》上的那一个‘小豆腐块’，它牵动着学生及学生的同学、家人、朋友，它对于学生的鼓励作用巨大，引来更多学生选修中文，也吸引着更多英国家庭走近中国。”

海外版为媒 联通世界

刘菲

中文是交流工具，也是沟通纽带。不论华裔子弟还是外国汉语学习者，不论在海外教中文还是在国内教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，《学中文》版始终是大家展示学习成果，交流教学经验的平台。一张报纸联通世界。

爱钓鱼的爸爸

曹梓文（17岁）

我有一个爱钓鱼的爸爸。他每个星期都去不同地方钓鱼。爸爸第一次钓鱼是10多年前朋友带他去米湖钓的，他的那套钓鱼装备也是一个朋友转让的，到现在还用。

爸爸很多时候都是晚上两三点出发去钓鱼，到下午才回来。听爸爸说，有一次在路上曾经和狼相遇，相距30米左右，双方都站住不动了，爸爸用强光手电筒照向它，狼在强光的照射下把头低下来，一转身跑了，爸爸才得以平安回家。

（寄自加拿大）

看恐怖片的经历

陈金婷（19岁）

小时候，我是家中的小女生，由于身边没有哥哥姐姐陪伴，所以叔叔就成了我唯一的玩伴。但实际上叔叔仅比我年长5岁。

大约是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叔叔迷上了恐怖片，那时才上初中的他常常去街上的一家音像店，租来一系列僵尸片和悬案片躲在家中看。对于一个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年，面对这些新奇的影片，叔叔心中自然是一半好奇，一半胆怯。而我作为叔叔的忠实小跟班，也就成为帮他战胜恐惧的“小工具”。

每到周末，叔叔为了引我上钩，总会准备许多我喜欢的零食和饮料，然后邀请我一起看影片。年仅10岁的我并不了解恐怖片的真正含义，只是为了零食。于是就兴致勃勃地答应了他。开演前，叔叔总会对我提前做点“思想工作”，他常底气十足地说：“看恐怖片是对人的锻炼，所以要从娃娃抓起。如果现在你提早学会了掌控心中的恐惧，将来必成大器。”随后拿出两个枕头给我，当作是抵御内心魔鬼的好工具。懵懂的我自然而然地相信了叔叔的话，心想，“只要有叔叔在身边，就一定会保护我，什么妖魔鬼怪我都不怕。”

记得有一部影片讲述的是一对新婚夫妇搬入新宅的故事，开始一切看上去都很喜庆祥和。天真的我便以为自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，年仅10岁就能战胜许多人都无法战胜的恐惧。谁知，当剧情发展到新宅已过世的前主人找上了这对新婚夫妇后，一系列的人鬼纠缠变本加厉地开始上演。只见叔叔一声尖叫，扯开被单，越过眼神发直的我直冲向楼下。面对叔叔惊愕的反应和电视机里的恐怖场景，我吓得闭紧眼睛，屏住呼吸，身体僵直，生怕自己的一丝动静会引起电视机里僵尸的注意。就这样过了20分钟，听到电视里的尖叫声渐渐缓和，我才慢慢抬起头，胡乱一抹脸上的鼻涕和眼泪便往楼下跑，紧张得连鞋子都没顾上穿。

这次观看经历对我造成了很长时间的恐惧。每天刷牙洗脸时总是多疑地偷看镜子里是否有怪物出现，在家时要打开家中所有的灯，希望以光亮驱赶走鬼怪，甚至还向妈妈讨了一副平安符挂在胸前辟邪。现在想来，这些举动十分可笑。长大之后，我明白了世界上并没有僵尸复生之说。所谓“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”。现在的我做事认真，不走歪门邪道，心中坦荡。这倒是歪打正着，应了叔叔的话，我确是比小时候勇敢了许多。

（寄自加拿大）

第一次走进中学

曹一尘（13岁）

第一次走进中学我很害怕，因为在那儿没有朋友，也不认识什么人，所以就无聊地走来走去。第一堂课很糟糕，因为我找不到教室，后来是跟着别的新生才总算走进了课堂。上课的时候我也没注意听讲，因为觉得一切很陌生。

几个星期后情况有所好转，我还交了几个朋友。中学比小学的功课多了很多，所以上中学后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了。慢慢地，我学会了怎么管理时间，也习惯了中学生活。

（寄自美国）



中国文化之花在美国校园开放

图为“中国文化日”活动现场

日前，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应邀在两所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“中国文化日”活动，受到美国师生的欢迎和称赞。

学院公园学校位于马里兰大学附近，是由大学支持建立起来的一所新学校，有400多名学生。在“中国文化日”当天，所有学生按不同时间段参加了活动。剪纸、书法、画脸谱、用筷子夹豆子……一方面学生被这些项目深深吸引，另一方面他们也富有创造性地参与活动。比如将剪的“喜”字和灯笼相结合，做出一件非常漂亮的作品；在京剧脸谱上配出出乎老师意料的颜色。

波多马克小学的汉语项目在本地最早设置也最有影响。“中国文化日”那天，波多马克小学体育场张灯结彩，除6个展台外，还有抖空竹、武术、舞蹈、团扇、踢毽子等十余种文化体验活动。全校300多名学生在校长的亲自指挥下按年级陆续进入会场，迫不及待地去寻找自己喜欢的活动。直到放学铃声响起，学生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（玉洁 敏恒）

找到一所适合孩子的中文学校

陈昱

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希望子女学好中文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。我们曾经尝试自己在家中教子女学习中文，回国时也买了大量的中文读物和影像教学资料，但是后来发现，除了听说方面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，读写的进步并不是很大，有时孩子甚至会出现抵触情绪。我们意识到，他们需要更为系统、也更有氛围的中文学习环境。于是物色中文学校的工作开始了。我们很快就确定了丹麦华人总会属下的中文学校。

如今，11岁的儿子余岳均已在这中文学校学了5年多了；7岁半的女

儿余安雅也追随着哥哥的步伐，在中文学校上了两年有余。原因很简单，我们看重这里的师资稳定且有经验，教学方法传统，课堂有秩序讲纪律。虽然只有每周六短短的两个小时，但是在能听懂的环境里复制出一个类似中国本土学校的教学小环境，这是很难能可贵的。我们的孩子相当于同时接受了两种不同文化下的学校制度。比如，在中文学校里，从一年级开始就有课后作业，期末有考试，学期中间有各种学习项目小比赛，而这些都是丹麦学校中低年级相对宽松的课程设置里没有的内容。

在华人总会中文学校里，我们的孩子开始学会迎接小小的挑战和考验，也开始体会“学习要刻苦”“一份付出，一份收获”这些基本的道理。

刚去中文学校时，岳均以在丹麦学校的态度对待学习，比较放松。我们对孩子也没有太多要求。中文学校里儿子的任课老师姓俞，是一位有着丰富国内和国外中文教学经验的老师。一天，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，岳钧课后没有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，在课堂上表现不好，需要督促。这时我们才醒悟，才意识到小孩子还是需要家长的监督协助，才能把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学到的知识在课后消化吸收。在我们的帮助下，岳钧开始逐步养成课后复习的习惯，迎头赶上进度。在第一次期末考试时，还获得了班级的鼓励奖。初步体会到学中文的乐趣，他此后年年进步，每次期末考试，成绩也都名列前茅。

为进一步调动孩子们学中文的积极性，中文学校把比赛形式引入教学环节，比如在2014年主办了首届汉字听写比赛。为了能参加比赛并取得好成绩，岳钧有好几个星期坚持背诵记忆听写指定的几百个生字词，周末时还跟我们在家里进行模拟练习。参赛当天，小家伙信心十足，和他的两个队友以近乎全部正确的成绩，夺得了

全校并列第一的好成绩。哥哥在台上的表现，也极大地鼓舞了在台下观看比赛的妹妹。女儿刚上中文学校不久，正好赶上学校组织的以“中国梦·我的梦”为主题的朗诵比赛。在老师的鼓励下，她报名参加，和小伙伴们一起登台朗诵。通过在中文学校的学习和参与中文学校组织的活动，孩子们开始认同父母的价值观。我们觉得在与孩子的沟通上更为顺畅了。

我们知道，学习中文不仅仅是语言学习，也是进行文化的浸润和熏陶。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为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做出了各种努力：比如送才艺人课堂，为学生进行书法启蒙，教学生唱中文歌曲，在中国传统节日开展庆祝活动，还创办了围棋班、民族舞蹈班。

我们认识到，在非母语的环境中学习中文，不能苛求孩子的中文水平，播下一颗喜爱中华文化的种子，教给他们基本的学习方法，为日后学习中文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才是送他们进中文学校的目的。长大后，童年时在心中播下的热爱中华文化的种子开始发芽，循着心中发芽的种子，继续学习和探寻中华文化，这也是我们作为家长最希望看到的。

（寄自丹麦）



图为陈昱正在辅导儿女学习中文